

高一涵评传

吴汉全 高大同 / 著



GAOYIHAN
PINGZHUAN



人
民
出

高一涵评传

吴汉全 高大同 / 著



GAOYIHAN
PINGZHUAN



人民教育出版社

责任编辑:马长虹

封面设计:伊木桃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高一涵评传/吴汉全,高大同 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5

ISBN 978-7-01-020493-2

I. ①高… II. ①吴… ②高… III. ①高一涵(1885-1968)-评传 IV. ①K82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9)第 041392 号

高一涵评传

GAOYIHAN PINGZHUAN

吴汉全 高大同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9 年 5 月第 1 版 2019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21.25

字数:340 千字 印数:0,001-3,000 册

ISBN 978-7-01-020493-2 定价:58.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65250042

自序

历史人物的研究是史学研究的基础,撰写重要历史人物的评传是史学研究中极为重要的工作。道理很简单,历史是由人们自己创造的,重大的历史事变、历史事件,都是人的主体性活动的产物。恩格斯 1890 年 9 月在致约·布洛赫的信中就说,“我们自己创造着我们的历史”,“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在此,如果对历史人物没有足够的把握,则很难说能够通晓历史的真谛。因而,从历史人物下手来研究历史,应该说是一个正确的研究路径,这已为古今中外的史学实践所证明。

然而,史学界对于个人研究的兴趣似乎发生了很大的转移,可以说已经不大重视个人经历的研究。此种现象,大致也不是近年来才出现的。李大钊在 1924 年出版的《史学要论》这部史学名著中,就对忽视个人经历研究的倾向提出了批评。他指出:

人以个体而生存,又于种种团体而生存,故人生有为个体的生存,有为团体的生存。人的团体的生存,最显著的例,即是国民的生存。今日史学所研究的主要问题,似为国民的生存的经历。记述为个人生存的经历者,谓之传记;讨论文化的发展者,谓之人文史,亦曰文化史;传记与文化史,虽均为历史的特别种类,然而个人经历与文化发展的研究,亦不能说不是史学范围以内的事。有人说,史学是专研究关于团体的生活者,而不涉及个人的生活。是亦不然。个人生活与团体生活,均于其本身有相当

的价值。团体生活的荣枯兴衰,固为吾人所急欲知,所急欲解喻者,而个人的经历与运命,又何尝不一样的感有此兴味?此等要求,盖为吾人自然的要求。且个人生活的研究,不但于其本身有必要,即为团体生活的研究,有时亦非研究个人生活不可。盖个人为构成团体的要素,个人的活动为团体生活的本源,个人在团体的生活中,实亦有其相当的影响,即亦有其相当的意义,故史学不能全置个人于度外。我们固然不迷信英雄、伟人、圣人、王者,说历史是他们造的,寻历史变动的原因于一二个人的生活经历,说他们的思想与事业有旋乾转坤的伟力,但我们亦要就一二个人的言行经历,考察那时造成他们思想或事业的社会的背景。旧历史中,传记的要素颇多,今日的史学,已不那样的重视个人的传记,因为团体的生活,在历史上的意义渐次加重了。然为团体生活的研究,似仍有为传记研究的必要。

笔者从2002年初开始研究高一涵这位五四时期著名的历史人物,在相关刊物发表了有关的研究论文,并在10年之后的2012年出版了《高一涵五四时期的政治思想研究》著作。这是学术界第一部高一涵研究的专著。在此期间,高大同先生编著的《高一涵先生年谱》及《高一涵监察工作文选》、六安市金安区政协委员会编撰的《高一涵文选》、郭双林和高波编的《高一涵卷》,也相继出版。这为研究工作提供很大的方便,也为高一涵评传的撰写提供了条件。但是,目前尚未有正式的《高一涵评传》公开出版。尽管我在多年前就想写出一部《高一涵评传》,但因为种种原因,一直未能动笔,这次与高大同先生合作,终于把这部评传写出来了,总算完成了自己的这个心愿。研究历史人物,必须要有年谱、文集、史料编年等资料性的准备工作。如果再有一部评传,那对研究工作将是一个很大的促进,并有助研究工作向深化的方向前进。因此,这部《高一涵评传》的撰写,应该说对于高一涵的研究是有意义的。

撰写历史人物的评传,不同的研究者,有不同的研究路数,不要求同一。但要写出一部较好的评传,还是要有讲究的。我认为,撰写历史人物的评传,必须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开展严谨的研究工作,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对历史人物进行客观的评价。同时,还需要有这样的几条:

第一,全面把握,突出重点。历史人物的思想、活动是丰富多彩的,有一个不断演进的线索,并表现出多个层面。由此,我们对历史人物的把握也就需要是全面的,不全面就不能把握整体,就不能揭示其丰富的内涵。然而,历史人物无论是思想还是活动,也是有其重点所在的,面面俱到地记述,写作中平均用力,就会成为流水账,读者看了也会把握不住重点及关键。因此,在全面把握的基础上,又需要突出重点。以高一涵这位历史人物为例,“全面把握”就是不仅要注意到其早年特别是五四时期的辉煌历程,也要注意到中年的监察生涯及诗词创作,以及晚年的工作、生活等情况;而“突出重点”就是要将高一涵的思想家、报人、文化人、著名学者这些方面凸显出来,尤其是要展示出其作为启蒙思想家的身份,及其在五四时期向西方探求真理、积极引进西方思想、引领舆论前进的形象。于此可见,“全面把握”是前提、基础,有助于凸显整体形象;“突出重点”是关键,有助于展示其特色、体现其精要、反映其风格、把握其主流。概而言之,评传的撰写既要“全面把握”,又要“突出重点”。

第二,坚持社会史的研究理念。唯物史观运用到历史研究中,就是要坚持社会史的研究理念,把历史人物放在其特定的社会范围之中加以考察和研究。社会是复杂的并且是一个系统,包含有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各个方面。于此,就要分析社会为历史人物提供怎样的条件,使历史人物能做什么和不能做什么,能做到怎样的程度。从社会演变来解释历史人物,这话说起来容易,但真正地贯彻起来却是不那么容易。这还只是一个方面,即从社会演变来诠释历史人物。另一方面,就是要研究历史人物怎样具体地影响社会的变化,说明历史人物发挥了怎样的主体性,又是如何发挥主体性,通过了那些关键的环节或关键的要素,来造就历史的。以高一涵研究为例,五四时期的历史环境对于五四时代的重要历史人物来说大致是一样的,那为什么高一涵不同于李大钊,没有率先成为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呢?高一涵也受十月革命的影响,在思想上是积极地欢迎十月革命的,并且也是最早地研究苏俄的政治制度,在唯物史观研究方面也有创造性的成就,可他与李大钊还是有很大的差别。事实上,他此时与胡适的思想更接近一些,但与胡适又有很大的不同,颇有些偏左一些的“自由主义者”的特色,或者说介于马克思主义者与自由主义者之间。对此,研究者当然可以列举出诸多的理由而加以解释。但笔者以为,从社会演

变的角度进行解释,社会是多层面的,但具体到某一个人来说,社会的各个层面的影响也是不一样的。有些人,是在政治的这方面接受社会的影响大一些,而在经济的、文化的方面接受的影响可能就小一些。换言之,不同的人作为精神自主、思想独立的个体,其实是千差万别的,对社会变化的感受程度和接受程度是不一样的,这自然会影响其思想的变化与发展。就此而言,同样是十月革命的“炮响”,高一涵对于十月革命的感受要比胡适强一些,因为他自觉地研究十月革命,但又不及李大钊,因为他对共产主义的“暴力革命”还保持着很大的距离。因此,坚持社会史观研究历史人物,要落实到位、走向具体化,仍然是需要认真研究的课题。

第三,对基本材料的考证和诠释。撰写人物评传必须根据既有的材料,将历史人物的活动和思想呈现出来。但是,材料不是能直接地使用的,而是需要加以必要的考证,将真确的部分揭示出来,方能正确地使用到研究之中。如果不加以必要的考证,就会对历史事实的梳理产生严重的障碍,所记载的内容也就可能以讹传讹。就高一涵的研究而言,他早年是否参加安庆光复和北伐队,就值得加以考证。确实,有一些回忆录曾说高一涵参与其事,但高一涵本人的相关文字中没有相关的记载。因此,关于高一涵是否参加安庆光复和北伐队,就得存疑。使用的材料需要经过考证这个环节,这是中国传统史学的一大特色,这个传统在近现代历史人物的研究中要加以继承。有人认为古代史研究需要强化考证的功夫,近现代历史的研究,考证就没有那么重要了。这个看法不对。事实上,撰写近现代的历史,须臾也离不开考证,例证很多,不一一列举。这里还要说的,对于业已考证的史料,研究者还要加以相当的诠释,使史料的历史意义尽可能地呈现出来,写人物传也是这样。譬如,高一涵在1920年春曾到日本进修政治学,现有著述中有一些记载,但记载失实的不在少数,如说他是游日学生团的成员,这就需要做细致的考证。而在基本史实清楚之后,具体地说明这次进修之中高一涵思想所发生的变化,这次进修对于高一涵后来政治学研究的影响,这就是一种诠释。又譬如,高一涵在留学日本期间参加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斗争,在考证出高一涵是“中华民国留日学生总会”的主要成员,是总会“评议部”的评议员、“文事委员会”委员长、“经费委员会”委员之后,还需要作出新的解释。根据留日学生总会章程中“本会设经费

委员会,其会员以各省同乡会会长充之”规定,结合高一涵是“经费委员会”委员这一事实,可推定高一涵为留日学生安徽同乡会会长。高一涵既然担任“文事委员会”委员长,而这个“文事委员会”又以委员长地位为最高,其次才是“编辑主任”(由李大钊担任),再下面就是5人担任“编辑委员”、18人担任“文事委员”;而按总会规定“文事委员会司本会(留日学生总会)撰著及刊行书报等事”,及《民彝杂志简章》规定“本志设编辑部于日本东京中华民国留日学生总会文事委员会”,可推知高一涵对《民彝杂志》负有最高的领导责任。经过这样的解释,不仅考证的史料得到具体而又有效地运用,而且史料的意义也得以显著地提升。因此,史料的考证是基础和前提,但史料考证之后还要加以进一步的诠释,从而真正地呈现史料的意义与价值,这样才能说研究工作比较地到位。

第四,具有多学科的研究视阈。撰写人物评传需要多学科视阈,这不难理解。因为过去的历史人物,特别是学术大家,不是只涉猎一个学科或一个学科的某一领域,因而今天的研究者对这样的历史人物进行研究,则必然地需要多学科的研究视阈。然而,今天的研究者要具有多学科视阈却是相当的困难,这与今天的学科单一化、专门化的教育有关。客观地说,学科专门化是学术研究的进步,有助于研究者专精一业、突出重点、促进研究工作的深入,但在研究的专门化之后不能通晓其他学科,也是很大的缺陷。就高一涵研究而言,也是特别需要有多学科的研究基础。高一涵是政治思想家、政治学家、政治活动家,研究者把高一涵作为历史人物进行研究,自然需要史学研究的基础,但如果仅有史学基础而没有政治学的相关知识,也是不能写出高一涵的政治思想家、政治学家的身份,当然也就写不出高一涵作为政治活动家的学理底蕴。高一涵在五四时期参与创办了不少报刊,有着报人、出版者、文化人的身份,研究者如果不懂得新闻学、新闻史、编辑学等相关学科,也是难以将研究工作推向深入。高一涵在“五四”以后花费了很大精力研究唯物史观,研究者如果没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和学术素养,也就很难说清楚高一涵在唯物史观研究方面的贡献及其所达到的程度。高一涵中年之后从事监察活动,并写下了大量的诗词,是著名的诗人,研究者如果没有古典诗学的功底,研究工作也就难以为继。这说明,撰写历史人物评传,特别是撰写具有丰富学术内涵的历史

人物的评传,必须要有多学科的研究视阈。

撰写历史人物的评传需要不断地创新,并且这种创新是没有止境的。我近来开始研究“话语体系”问题,这起初是源自于文本的研究工作,思考于学科的建设问题。按照我现在的看法,研究话语体系固然需要探讨许多具体的问题,但有三个基本的方面却是要重点研究的。其一,是要研究“话语结构”,主要研究和把握“研究对象”的历史观、方法论、基本命题假设、关注的主要问题、关注问题的视角及基本的范畴等六个层面,这样就能解决“是什么”的问题。其二,是要研究“逻辑谱系”,主要是在社会历史演进的视阈中研究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及实践逻辑,把握传承中的逻辑进路与逻辑关系,这就需要梳理其内容,解析其相互关系,从而在更高的层次上来把握“研究对象”,使研究工作上升到探求规律的层面。其三,是要研究“基本维度”,即要进一步探讨“研究对象”所展示的历史维度、民族维度、现实维度、世界维度及实践维度这五个层面,看看“研究对象”有着怎样的视阈及达到了何种的地步。如果有可能,我打算写一部《话语体系论要》的著作,系统地说明自己关于话语体系研究的主张。这里要说的是,话语体系本来是用来研究文本的,但同时也是可以用来研究各个学科的,因为不同的文本、不同的学科皆有话语体系的问题。进而言之,话语体系的理论作为研究工作的基础性理论,也是可以用来研究具体的历史人物的。譬如,历史人物要有所作为,历史人物作为独特的社会存在,大致也不能不涉及历史观、方法论、基本命题假设、关注的主要问题、关注问题的视角、基本的范畴这六个层面。如此,我们的研究如果能将这六个层面弄清楚,就能更好地接近历史人物的本身。又譬如,历史人物作为社会的存在,都得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活动,都得展示其历史逻辑和实践逻辑,自然也就可以从研究的角度来抽绎出其理论逻辑。那么,研究者如果将历史人物活动的历史逻辑、实践逻辑、理论逻辑叙述清楚,则对历史人物的认识就可以更进一层。再譬如,历史人物作为有意识、有目的的生命体,总得展开自己的思维、提出自己的主张、形成自己的思想,甚至还创造出理论体系,故而也就会在这种思维、主张、思想或理论体系中表现出历史维度、民族维度、现实维度、世界维度及实践维度,尽管这种表现不一定都达到深刻、精湛、到位的程度,但存在着这五种维度也是很显然的。于此,我们的研究者如果能将这五个基本维度描述出来,

并尽可能探求这五个维度基本成因、衍化轨迹及相互关系等问题,这肯定有助于研究者把握历史人物的视阈之维,并进一步刻画历史人物的心理世界及其在思想上理论上所达到的高度。我提出运用话语体系的相关理论来研究历史人物,在现在还只是一种初步的学术设想,但应该说是有助于历史人物研究的。笔者的看法是,写历史人物的评传如果要有所创新的话,也是可以有意识地运用话语体系的相关理论或相关观点,尽管话语体系的系统理论在目前还没有成型。

从学术研究的规律来看,写出的历史人物的评传,只是阶段性研究工作的完成,并不是说这项工作就此结束了。事实上,评传的工作还要继续下去。这部《高一涵评传》是学术界研究高一涵的第一部评传,对高一涵的一生作了历史的描述和学术的评价,并尽可能地汲取了笔者撰写的《高一涵五四时期的政治思想研究》著作及发表的相关论文的研究成果。当然,这部《高一涵评传》只是在当下的学术研究背景中的一个研究成果,随着研究工作的深入,还要写出不同的《高一涵评传》的。我希望,在不久的将来,能够看到更多的《高一涵评传》及高一涵研究专著的出版。

吴汉全

2016年2月5日

目 录

自 序	1
第一章 少年时代	1
家世	1
启蒙	4
步入新式学堂	6
安徽高等学堂的求学之路	8
革命带来的冲击	11
第二章 留学日本(1912—1916 年)	16
酝酿出国与留学明治大学	16
加盟“甲寅”结三友	20
参加社团与创办《民彝》	30
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	33
宣传“主权在民”的国家观	38
阐发政治调和的思想	43
第三章 办报启蒙(1915—1917 年)	48
《青年杂志》的二号人物	48
没有到职的《晨钟报》编辑	74
与李大钊协办《宪法公言》	78
《甲寅日刊》的主将	81

第四章 新文化运动精英	90
舆论骄子	91
引进西方政治思想	97
争自由的号手	100
新文学和白话文运动的捍卫者	110
欢迎十月革命	116
第五章 为五四运动摇旗呐喊	129
引领舆论走向	129
拒绝和约签字	134
散发《北京市民宣言》	138
对五四运动的总结	140
第六章 北大的教授生涯	143
著书与讲学	143
赴日研修	147
研习唯物史观	154
校内外的政治活动	169
抨击军阀的专制统治	177
第七章 结友胡适及经营《努力周报》	198
与胡适交往	198
经营《努力周报》	200
《努力周报》中的四次大讨论	209
与胡适的渐行渐远	224
第八章 著名政治学家	231
政治学研究开拓者	231
政治哲学研究	235
政治学专著中的主要观点	250
第九章 南下革命	257
南下革命的起因	257
上海途中的入党申请	260

在武汉的日子	261
第十章 中年的监察生涯	264
独具特色的监察思想	264
打老虎与查办要案	271
履行监察的使命	275
专项调研与建议	280
第十一章 诗人情怀	284
敦煌卫士	285
以诗记史	293
第十二章 不寻常的晚年	299
迎接新中国的诞生	299
为新中国法制建言献策	301
政治运动中的自我改造	305
“文革”蒙难	310
附 录	313
后 记	324

第一章 少年时代

高一涵的少年时代在其一生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值得加以记述。1885年4月4日(清光绪十一年二月十九日卯时),古六安州南官亭堡田埠榜——皖西一个山清水秀的小村庄内^①,一个婴儿呱呱落地,高家大书房庄的主人高显墀,为他取名永灏。这就是后来成为中国近现代史上著名的启蒙思想家、政论家、法学家、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中国现代政治学重要奠基人的高一涵。

家 世

根据六安《陈门高氏宗谱》^②记载:“自胡公满封于陈,以国为姓,历周秦汉……至道寿公九十六世,由沔阳迁六安,易里改姓,而陈姓之九十六世孙,遂为高氏之一世祖云。”即六安陈门高氏一世祖道寿公,系陈姓九十六世孙,元末明初,由沔阳迁六安,易里改姓,成为六安陈门高氏一世祖^③。

高一涵为六安陈门高氏三门思让公支下第二十三世孙。本支世家中最显

① 即现六安市金安区东河口镇内,距六安市一百二十余里,东与舒城接壤,西与霍山毗邻,北与皖西大裂谷大华山景区交界,金狮寨古战场也在境内。相传天公得知皋陶帮助大禹治水,降下36头镇水狮,其中,头就蹬在金狮寨寨南坡,故而得名。清代兵部尚书涂宗瀛、台湾道台熊一本、太平天国天官丞相朱纆、民革中央主席朱蕴山、国民党地方首席法官邵六清、周恩来黄埔校友邵行阁等都出生、生长在这块人杰地灵的土地上。

② 本书所引《陈门高氏宗谱》,引自安徽六安《陈门高氏宗谱》第十三届修缮本,以下简称“宗谱”。

③ 高一涵本门一族世系表,摘选见《高一涵先生年谱》,上海文化出版社2011年版,第9页。

赫,对高氏子孙影响最大的,当属其高祖高熙爽(庠名贤)和祖父高灿炉。

高祖高熙爽(1758—1817年),为清郡庠生^①,庠名贤,字见恩,号燕左,亦号圣宗。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礼部据六安州公举、安徽巡抚奏请,上奏呈请将高贤入祀乡贤祠,奏章称:“高贤安徽六安州人。少能励志,长益多闻,为学专以圣贤大义微言为本,荟萃先儒性理之书一意,著作有《四书解读》、《春秋节释》、《周礼义疏》、《河洛理解》、《道统一贯述》及《马史韵编续》、《龙文鞭影》诸书……高贤学有渊源,品臻纯粹……居平必衣冠而处,虽盛暑不去长衫,品行清高……公同酌核请将高贤入祀乡贤祠。”此奏请,获皇太后慈禧和光绪皇帝恩准^②。这一年,高一涵9岁。

祖父高灿炉(1821—1854年),字纯青,年甫十三,丧父,“弱冠授室,任理家务,操持门户,性至孝奉。”早年守祖业而读父书,应童子试,名列前茅。1853年,太平天国数十万大军,入皖攻城略地,四乡土匪蜂起,其挺身而出,“起练保乡,编丁壮、整器械、募劲勇、明号令,剿匪御贼,期不受屈辱,以报国家。每贼至堵击,君同诸英俊率练身先,所向辄捷。而君沉勇多谋,擒捕土捻尤众。众群匪震慑敛迹,闾里获安。”1854年5月,匪患又起,终遭匪设伏,身中五十余处创伤而身亡,时年33岁。咸丰十一年(1861年),奉旨入祀本乡忠义祠,事载六安县志^③。

本门家族中二位先辈,均受皇恩奉旨入祀乡贤祠和忠义祠,对皖西这一僻静的小山庄,所带来的震撼是无与伦比的。巨大的光环,随之而来的也带给儿孙们以巨大的压力。

高一涵的父亲高显墀(1842—1892年),清纵九品衔,部名赞臣,字联臣,号殿南。因父亲早逝,十三岁时便不得已弃读经商,然心有不甘,时时不忘继承书香门风。为人忠厚,刻苦持己,宽厚待人,孝友睦姻,为乡人所赞颂。平日疏财济急,至去世时已负债累累。晚年谆谆嘱儿孙:“吾家自高曾以来,除耕读两件外,别无生业,如吾者,权为衣食计,不足为后人法也。汝等就读就耕,恪遵先业,则吾无憾矣。”终其一生,他把承继高祖遗风的重任,压在了儿孙们

① “郡”为古代行政区域,相当于州;“庠”为古代学堂,“庠生”是对秀才的尊称。

② 《礼部奏折》,《宗谱》卷三十三,第78—79页。

③ 《旌表义烈高君纯青传》,《宗谱》卷三十一,第72—74页。

的身上^①。

高一涵的母亲胡夫人(1845—1917年),幼时随外祖母逃避战乱,常在深山丛林间过夜,还不能自保温饱,故入高家当童养媳,备尝艰辛。一生勤劳节俭,每日早起亲理园圃,除草灌水,事毕即在房中率二女纺织,每晚必至三更后方休。年出纱数十斤,制布二十余匹,除婚嫁外,家中用布皆出自自纺。胡夫人一生共生四子二女。四十一岁时,生高一涵,为第四子,对其疼爱有加^②。

高一涵长兄高永著(1862—1916年),清郡庠生,庠名梦溪,字熔经,号册章,九岁读私塾,背负传承高祖遗风的重任,以求科举功名。41岁时,仍第四次应江南乡试(即省级考试),“消磨毕生精力,仅以一附生(秀才)终其身”。高永著31岁时,父亲去世,亲理家政,靠教私塾、收田租营生,省吃俭用,历时九年,方与二弟合力将债务还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为先高祖入祀乡贤祠及其所著《易经初学快观》之刊行,所费不下数百金”。高一涵自幼便从长兄读书,从中学堂到高等学堂“每年学膳书籍等费,均由先兄节衣缩食以供应”。高一涵“在外读书期间(含留日),得先兄之书数百封”,故其“对于先兄,总觉畏惧之心少,而爱戴之意多”^③。

二兄高永昭(1871—1942年),清郡庠生,庠名梦龄,字涣文,号德章,科举制度下,“寝馈于八股制艺中二十余年,应童子试八九次,始得补博士弟子员(秀才)”。民国以来,六安地区迭遭匪患,匪患刚平,又逢抗战,二兄节衣缩食,以供粮草、以纾国难,而自奉益薄。于抗战中,溘然长逝。高一涵17岁时,从二兄读书,亦深受其影响^④。

三兄高永澈(1880—1919年),清纵九品,部名梦松,字澄清,号槛章,科榜无名,捐了个清纵九品衔^⑤。故家乡人称:“高氏一门三秀才,三不秀才。”

高一涵有两个姐姐。大姐1869年生人,嫁徐门;二姐1877年生人,嫁胡

① 高永著:《联臣府君行述》,《宗谱》卷三十二,第56—58页。

② 高一涵:《先母胡夫人行述》,《宗谱》卷三十二,第96—98页。

③ 高一涵:《先兄熔经传》,《宗谱》卷三十二,第103—113页。

④ 高一涵:《二兄德章传》,《宗谱》卷三十三,第1—4页。

⑤ 《宗谱》卷十五,第69—70页。

门^①。两个姐姐对高一涵皆呵护有加。

高一涵的家庭环境是很特别的。出生于这样一个带着光环的耕读世家，高一涵自童年起，即背负着承继高祖、祖父遗风，精忠报国、光宗耀祖的重任。好在，有饱读经书爱他疼他的大哥，做了他的启蒙老师。

启 蒙

高一涵少儿时代的启蒙老师，是比他大 23 岁的长兄高永著。从幼童起，长兄就着力引导他对读书的兴趣。所用教材，即为当时普遍选用的《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千家诗》等。高一涵在《先兄熔经传》中记道：“余幼从长兄读，且读，且与群儿戏，一句书，每口教数十遍，而不怒。”且读，且游戏，不逼不怒，日积月累，慢慢培养起高一涵对读书的兴趣。

高一涵 7 岁时，父亲去世，长兄高永著挑起了亲理家政的重任，在家设立私塾，教育村中贫寒子弟，以补家用。高一涵也正式进入长兄的私塾就读。在识字、作文之余，开始阅读经、史、历、算等知识，兼习当朝律令以及冠、婚、丧、祭等礼仪。教材也逐步增加到《孝经》、《小学》、《论语》、《孟子》、《大学》、《中庸》、《诗经》、《易经》、《礼记》等等，当然高祖所著的《四书解读》、《春秋节释》、《周礼义疏》、《河洛理解》、《易经初学快观》等诸书，更是高一涵求学时必读之书。对长兄的教育方法，高一涵多年之后仍记忆犹新，并称赞有加：“先兄教余，不执己见，常因势利导，俾余性有充量发展之余地。故余对于先兄，总觉畏惧之心少，而爱戴之意多。于此见先兄循循善诱之功焉。”^②

高一涵从入家兄私塾起，便开始了每日的夜读。高一涵在《先母胡夫人行述》中记道：“余幼从先长兄读，夜读每至二更时始罢，每归寝室，见先母率诸姐犹在灯下纺织。先母展被褥使余寝，待余熟睡后，仍起纺织如初，非至三更后不辍。邻人有夜过吾门者，辄羨曰：有读书声与纺织声，若此家安得而不

① 《宗谱》卷十五，第 66 页。

② 高一涵：《先兄熔经传》，《宗谱》卷三十二，第 103—113 页。